

绪 论

合浦是汉代岭南七郡之一,《汉书·地理志》明确将其记载为汉代海外贸易的始发港口之一。合浦包括南越国时期遗存在内的汉代遗存在岭南地区秦汉考古学研究、百越民族史研究及海外交通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汉代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上的重要港口和节点城市,大浪古城、草鞋村古城及合浦汉墓群等相关史迹点已经被列入2012年^[1]和2017年^[2]编制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不过,相较于岭南地区南越国遗存(参见第二章第一节)和合浦汉代遗存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合浦南越国遗存的认知尚不清晰,对南越国治下合浦地区社会面貌的整体考察几乎是空白。

合浦汉代遗存包括墓葬和城址两部分。其中合浦汉墓分布面积约68平方千米,估算地下墓葬埋葬量近万座^[3],发掘墓葬数量超过上千座(参见第三章第一节),其中包括部分南越国时期墓葬。发现汉代城址2座,发掘者推测大浪古城为合浦县始设的治所,修建年代不早于西汉中期^[4];认为草鞋村遗址为东汉合浦郡的郡城,作为郡治的年代可能早至西汉晚期^[5]。大浪古城和草鞋村古城作为“两汉时期合浦港的先后所在地”^[6],与周边墓群共同构成了汉代合浦城市和港口的考古学聚落景观。战国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合浦汉墓、汉代城址的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成果^[7],为合浦南越国遗存的辨识和研究奠定了基础。

秦代合浦属象郡管辖,有学者认为位于象郡南部^[8]或北部^[9]。南越国设置有南海、桂林等郡县,并分封了苍梧秦王等王侯^[10],不过当时合浦地区的行政设置未见记载。有学者根据“劳邑执到”琥珀印^[11]和“朱庐(卢)执到”银印^[12],推测“朱庐、劳邑似均为秦桂林郡的属县,或南越国自置的县名”,朱庐地望在今广西博白县至玉林市一带^[13],劳邑在今玉林市境内^[14],均位于合浦周边。广州象岗南越王墓的后藏室出土有“邻乡侯印”封泥,发掘报告认为“邻乡”为南越国自置的郡名,推测其位于毗邻长沙国的南越国北境^[15]。在西汉武帝设置的岭南七郡中(不包括海南岛上弃置的珠崖、儋耳两郡),南海、郁林、苍梧、交趾、九真、日南六郡与南越国的郡国行政区划设置大致有所对应,只是西汉合浦郡方向无从着落。近年来在合浦识别出一批南越国时期遗存,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具有一定基础,有学者推测“邻乡”或在合浦方向,南越王墓的一些海外贸易产品可能就是邻乡郡所贡献的^[16]。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置的合浦郡领徐闻、合浦、高凉、临允、朱卢五县,王莽时改合浦郡为桓合郡,合浦县为桓亭县;东汉末年孙吴政权于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分合浦郡地置高凉郡,东吴黄武七年(228年)改合浦郡为珠官郡。“劳邑执到”和“朱庐执到”两方印章当属于南越国末期,与合浦周边地区的土著越人部

族有关，据此推测当时偏远的合浦地区还有劳邑^[17]等类似于秦汉属国、县“有蛮夷曰道”（《汉书·百官公卿表》）之类的羁縻设置^[18]。有学者推测南越国灭亡后“原朱庐、劳邑二县改隶合浦郡”，朱卢县“可能是沿用南越时的旧名”^[19]。此外，东汉朱卢改称朱崖^[20]，有学者认为西汉晚期至萧齐期间大陆王朝一直在海南岛设置县级政权^[21]；认为东汉时期的海南岛尚属合浦郡管辖，并将“朱庐执圭”银印释为秩比二千石的武职佩印，与朱卢县的“都尉治”相符合^[22]。

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族群分布格局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动态结构，而以秦定岭南、南越国灭亡、两汉交替形成若干时间节点^[23]，引起族群分布格局发生剧烈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中原等地区人群的南下。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的土著越人与断续南下的楚人、秦人、汉人相互糅杂，逐渐形成次生越人，至汉平定南越以后的西汉中后期逐渐发展为土生汉人^[24]。战国西汉时期合浦地区原本为西瓯、骆越杂居之地，东汉以来尚且多有俚、蛮、乌浒之属。包括南越国时期在内的合浦汉代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变化，体现着岭南地区汉文化形成发展的阶段性轨迹和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历史进程。

汉代岭南地区逐渐演化为两大社会文化板块，至东吴黄武五年（226年）最终形成交、广分治的行政格局。在岭南地区的北部、东部，即自西江上游诸河流（漓江—桂江、贺江、郁江—浔江）至西江干流及珠江三角洲，还包括北江流域和东江流域，属于南海郡、苍梧郡、郁林郡和零陵郡一部，为一个社会文化板块；在岭南地区西南部，即环北部湾沿岸及越南中部，属于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四郡，为另一个社会文化板块^[25]。这两大社会文化板块的历史基础肇始于南越国时期，合浦在此社会文化格局中居于联结两大板块的过渡地带。

汉代合浦郡“西起钦州，东达新兴、阳江，包括雷州半岛和海南岛”^[26]，汉代合浦县“大致相当于今广西北海市、钦州市的全部和防城港市、玉林市的大部及广东省廉江市等地，面积为现今合浦县的10倍以上”^[27]。本书以现今合浦县境内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心，在既往研究基础上识别出一批南越国墓葬，并结合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材料和相关城址材料，对合浦南越国时期居民的族属、社会身份、习俗风尚、生计方式以及海外贸易与海上交通路线等问题进行概括考察，初步形成了南越国时期合浦地区社会文化面貌和社会文化发展脉络的整体认识。

本书最后在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整体文化格局中讨论了岭南地区南越国墓葬的文化属性、汉代合郡置郡的历史背景、秦汉时期合浦郡的历史地位，以及汉代合浦与南流江文化廊道的关系等问题，进而阐明了合浦在秦汉时期岭南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为北海市、合浦县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利用和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提供了学术支撑。为了进一步说明秦汉时期合浦与岭南其他地区（包括越南北部）的文化关系，从不同侧面丰富对合浦南越国遗存的认知，本书将若干相关

研究论文列为附录。

- [1]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征求意见稿),2012,第14页。申报文本涉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广东省广州市,福建省福州市、泉州市、漳州市,浙江省宁波市、丽水市,江苏省扬州市和山东省蓬莱市。
- [2]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申遗文本》(内部资料),2017,第103页。申报文本涉及广东省广州市、江门市,福建省泉州市、漳州市、莆田市,浙江省宁波市、丽水市和江苏省南京市。
- [3] 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2015,第37页。
- [4]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大浪古城址的发掘》,《考古》2016年第8期;广西文物工作队课题组:《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合浦港的考古学实践与初步认识》,载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第39-50页。
- [5]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广西师范大学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合浦县草鞋村汉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8期。
- [6] 熊昭明、韦莉果:《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第48页。
- [7] 谭玉华:《合浦汉墓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14;富霞:《合浦汉墓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 [8] 钱宗范:《秦汉时期岭南历史地理若干问题的探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 [9] 杨武挺:《略论合浦汉墓及其出土文物的特点》,载《岭南文物考古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17。
- [10] 张荣芳、黄森章:《南越国史》(修订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114-115页。
- [11]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第46-56页。
- [12] 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省近五十年文物考古工作概述》,文物出版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第346-358页。
- [13] 全洪:《试从考古资料看南朝海南岛重置郡县问题》,载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
- [14] 蒋廷瑜:《“劳邑执刳”琥珀印考》,《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4期。另参见饶宗颐:《岭南考古论题——杨武挺《岭南文物考古文集》序》,载《岭南文物考古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17。
- [15]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第310页。
- [16] 郑君雷:《汉印与岭南汉代史迹》,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科学出版社,2019,第232-243页。
- [17] 蒋廷瑜:《“劳邑执刳”琥珀印考》,《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4期。
- [18] 郑君雷:《汉印与岭南汉代史迹》,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科学出版社,2019,第232-243页。
- [19] 全洪:《试从考古资料看南朝海南岛重置郡县问题》,载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
- [20] 关于合浦郡西汉朱卢县与东汉朱崖县的关系及其地理位置存在争论。谭其骧先生认为《续汉志》中记载的朱崖县为朱卢县之误,很可能在今广西博白县或玉林市;杨武泉先生认为《汉志》中记载的朱卢应为朱崖传写之讹,位于今海南岛上。参见谭其骧:《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附论梁隋间高凉冼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杨武泉:《西汉晚期至萧齐海南岛不在大陆王朝版图之外——与谭其骧先生商榷》,《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谭其骧:《再论海南岛建置沿革——答杨

武泉同志驳难》，《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21] 杨武泉：《西汉晚期至萧齐海南岛不在大陆王朝版图之外——与谭其骧先生商榷》，《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22] 李勃：《汉元帝罢珠崖郡后海南岛之归属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

[23] 郑君雷：《岭南汉城与西汉时期岭南汉文化的形成》，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科学出版社，2019，第219-231页。

[24] 郑君雷：《俗化南夷——岭南秦汉时代汉文化形成的一个思考》，《华夏考古》2008年第3期。

[25] 郑君雷：《岭南汉城与西汉时期岭南汉文化的形成》，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科学出版社，2019，第219-231页。

[26] 蒋廷瑜、彭书琳：《汉代合浦及其海上交通的几个问题》，载《桂岭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第199-208页。

[27] 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2015，第37页。